

72年后,战地家书重返英雄故乡

1953年5月14日,朝鲜半岛战地,一位名叫程可忠的年轻志愿军战士写下一封家书。第二天,他便倒在了硝烟中。这封未寄出的信,埋入历史尘埃。72年后,经由一名韩国教授、浙江大学校友会和热心人士的接力,这封家书得以归乡。

来自战地的家书

1953年5月14日,朝鲜半岛战火弥漫。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军却仍在谈判桌上频频提出无理要求,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胶着期。

而在朝鲜金化郡的一处坑道里,志愿军战士们接到突击任务。突击,意味着用生命迎着炮火前进。有人从怀里掏出纸笔,战士们轮流伏身写信。

步话兵程可忠匆匆写下:“亲爱的爸爸妈妈全家老幼们……我今天接受人民上级交给我最光荣和最坚决的突击任务,高兴万分,为人民立功时间到了……”

然而,他没能等到胜利那天。建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资料显示,1953年5月15日,就在写下家书的第二天,年仅25岁的程可忠在战斗中牺牲。两个多月后,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可他并没有料到,这封信,竟在路上走了足足72年。

樟树下的思念

在建德下涯镇马目村口,

有棵300多年的老樟树。七十多年前,骆花花大着肚子,在树下送走丈夫程可忠。

这一别竟成永诀。1954年,总在樟树下张望的骆花花,只等来一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当时她直接哭昏过去。”程可忠侄子程银贵说。

每年除夕,程家的八仙桌上总要多一副碗筷,碗里盛饭,杯里倒满饮料。“奶奶相信爷爷还活着。”程婕说。

2013年,84岁的骆花花临终前,嘱咐孙子要把中堂的军装照取下,和自己葬在一起。丈夫的身影,骆花花没能等到;父亲的陪伴,程利民也未曾拥有。生命最后几年,程利民住在女儿家,病痛越是严重,他越是念叨:“我这辈子没见过爸爸。”正因如此,当家书辗转而来,显得格外沉甸。

2018年底,韩国国立公州大学副教授金相圭偶然接触到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档案,里面有大量战地家书复印件。耗费数年,他整理出300

余封,希望找到家书的收件人或后代。“我这么做,是因为无论是哪国人,思念家人的情感都是一样深切的。”他说。

2025年7月15日,金相圭将信发布在社交平台。次日,他联系上浙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张美凤。很快,几位建德校友和热心网友行动起来,电话一路打到建德市下涯镇。不到3天,经数人接力,这封家书完成了跨国“投递”。老樟树下,当年没能等到的人,如今迎来了他的信。

英雄,从未远去

2025年7月22日,程可忠的孙辈程瑜、程婕兄妹回到建德市下涯镇马目村。在奶奶坟前,程瑜把家书念了一遍。再往上,是父亲的坟。他又念了一遍。

现在程瑜开始协助金相圭让下一封家书“回家”。一封深粉色的信,是署名“和琴”的女士写给丈夫、志愿军战士郑光贵的回信。信中写满思念,希望丈夫能寄回一张全身



▲程可忠烈士写于1953年5月14日的战地家书扫描件

照。2025年7月底,在淳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如今103岁的汪和琴。“我们家虽有遗憾,但希望这封信能给她慰藉,也算是一种完满。”程瑜说。

另一封信来自淳安的信,是一位父亲写给志愿军战士余年福的。他因久未收到儿子消息日夜忧思,再三叮囑,“接到这封信,请即回音。”程瑜再次帮忙联系,浙江大学校友会也发动校友力量。2025年9月中旬,当地部门经过多轮档案查找和实地走访,跨越两省一市,终于在江西寻得后人。

在程瑜看来,寻找的过程本身,既是对战士家人的交代,也是对历史的告慰。截至目前,金相圭发布的7封志愿军烈士家书,已有6封找到烈士后人或亲属。

(综合潮新闻、《中国国防报》)

“跑单姑娘”田丹:把日子跑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3月2日,全国妇联在北京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暨表彰大会。外卖骑手田丹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这是首次有外卖女骑手获得此项荣誉。



送外卖也是一门“学问”

2020年,在家围着孩子转了5年的田丹,在哥哥的劝说下,踏入了外卖骑手这一行。彼时的她,带着脱离社会的胆怯,还有对未来的迷茫,连跟人说话都小心翼翼。她成了骑手队伍里最“笨拙”的一个,不会抢单,只能捡别人挑剩下的远单、低价单。

6年前,选择成为骑手的女性还很少,“平台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减少爬楼的订单,也不会因为你是新手,就放宽超时的考核”。女性的生理特点,让她在外跑单时常常面临如厕难、生理期不适等难题;就餐不规律、风吹日晒,让她的皮肤变得粗糙起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沧桑不少。这些困难,

田丹都靠自己的毅力一点点扛了过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田丹的配送技巧愈发纯熟,一步步从接“小白单”升级到能接5公里以上的同城单,甚至是来回100多公里的远单,还能一口气接下沿路五六单。

第一次找到了“价值感”

2022年3月,上海城市按下暂停键,当时的外卖平台组织了应急特需车队,招募有私家车的志愿者跑全城配送送物资。当时丈夫刚巧把自家车从外地开到上海,田丹第一时间报了名。4月,上海市儿童医院互联网药品订单严重积压,许多孩子的处方药断供,平台紧急成立“宝宝送药专车”,田丹被推选为志愿者小分队队长,也是整个车队唯一的女性骑手。

从那时起,她带领团队开启了全城免费配送处方药的工作,这些药品里,有罕见病用药,有孩子一天都不能停的药,有些收件地址离医院超过

80公里,甚至远至崇明,往返一趟就是上百公里。

为了随时接受任务,她住在自己的长安小轿车里,饿了干嚼方便面,累了前排座位放倒就是床;水也不敢多喝,因为找个厕所要跑几十里地。她在车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最后身上的衣服几乎都要粘在皮肤上了。

田丹说自己永远忘不了,一位母亲等在门口收药的焦急样子,“那位母亲哽咽着,称我为‘救命恩人’”。她至今还保留着一条短信:“孩子说阿姨是‘孤勇者’,真的谢谢你。”这时候,一切辛苦都烟消云散了。

这期间,田丹和团队送出2000余单儿童药品、配方奶粉和尿不湿,她也被大家亲切称为“奶粉妈妈”。

那段日子里,支撑她走下去是内心的一股力量:“我没有想到,只是做了一些平凡的工作,会帮到这么多人,30多岁了,我好像第一次找到了‘价值感’……”

做回“爱跑单”的姑娘

这几年,田丹迎来了不少

高光时刻:上海市五四青年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2025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她还做过两年的站长,最后却主动辞去了这个职位,选择做回一名“跑单”的姑娘,因为更爱自由,也因为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她给自己的2025年总结了3个关键词:辛苦、被需要、成长。2026年,她自己的人生关键词里,加了“家庭”两个字。她和丈夫结婚16年,从未吵过架,丈夫最初是最反对她做骑手的人,担心她的安全,心疼她风吹日晒,如今却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如今她的大女儿上初三,面临中考,小女儿上五年级,即将小升初。“2026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和孩子。”

如果有一天跑不动了怎么办?田丹说希望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让心中的“价值感”继续在平凡的日子里,静静发光、慢慢滚烫。

(摘自《新民晚报·家庭周刊》)

保俶塔、雷峰塔、六和塔,都是他在位时建的

杭州景区有许多塔,其中数保俶塔、雷峰塔与六和塔名声最大。三塔形象各异:保俶婀娜似少女,雷峰沧桑似老衲,六和威武似将军。形象迥然不同的三塔却同系一人——都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弘俶在位(948—978)期间建造的。

《咸淳临安志》说,保俶塔开宝元年(968)钱氏建,旧名应天塔。明徐一夔《重建宝石山崇寿院记》载:“咸平中(998—1003),僧永保有目眚,誓修宝塔,以还光明,化缘城府,十阅寒暑,市人咸以师叔称之。塔既完,人因呼为保叔塔。”

自塔成至明朝一直称之为“保叔塔”,有人望文生义,编造了“宋嫂为保佑小叔造宝塔”的传说:北宋年间,宝石山下住着一户姓宋的两兄弟,弟弟十岁时父母双亡,兄长挑起



▲从左至右依次为保俶塔、雷峰塔、六和塔

养家的责任。十年后,哥哥娶妻生女,就近开了一家豆腐店,弟弟则做点小本生意。一日哥哥被抓了丁,至江苏吴江境内夜宿时巧遇弟弟。兄弟抱头痛哭,弟弟说:“兄有家室,嫂子和侄女需照顾,你一走这个家就塌了;我单身一人,无牵无挂,我替兄长去服役。”哥哥回到家中,宋嫂感兄弟之情深似海。次日起,宋嫂

天天上宝石山大石佛院烧香拜佛,祈小叔平安,并立志在宝石山上修一座长生塔,保佑小叔早日平安返家。乡亲们感于宋嫂的善良和平日里慈善济贫,纷纷出钱出力出料,塔成,名“保叔塔”。

雷峰塔始建于公元975年,历时六年完工,初名皇妃塔,是钱弘俶为庆祝其宠妃黄氏得子而建。该塔位于西湖

鲜为人知的另一首《义勇军进行曲》



著名作曲家黎锦晖(见图)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一个月内,于1931年10月10日就刊载在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上。而田汉、聂耳的同名作品诞生于1935年5月,比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晚了三年多,却大受民众的欢迎。

黎锦晖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如下:我国不幸,水灾兵祸,受尽折磨!暴日乘机,兴兵抢夺,杀人放火。奋斗救国,动起干戈,我们来尽忠报国!快把那万恶帝国主义打破!

本着三民主义精神,合力齐心!爱护民国,誓为忠勇的国民。奋斗牺牲,智勇忠信,组织成义勇军。雪耻救国是我们责任!打起精神,努力操练,勇敢强壮!战斗技能,学识方法,无不精良。服从命令,严守规章,有朝开往战场。奋勇将暴日的蛮兵扫荡!我们同心!努力拼命!誓把国保!杀尽敌人,收复领土,耻辱自消。国际地位定可提高,行总理大同遗教。黎锦晖的《义勇军进行曲》

为什么两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命运大相径庭?究其原因,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词曲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歌词延续了旧制的尾字押韵,句式对仗工整。但作为一首进行曲式的战歌,歌词结构过于拘谨繁琐,欠缺灵活性和召唤感,再加上因循旧制的曲式结构,整首歌曲显得缺乏时代感和力量感,同黎氏善作的流行歌曲毫无二致;歌曲中采用的传统C宫调式似乎依旧摆脱不了民间小调歌曲的影子,旋律过于“软性”,致使乐曲丢失了战歌应具备的紧迫感和坚定感;节奏过于简单,导致歌曲灵动有余而力量不足。(摘自《党史博采》翁婉琳、吴继金/文)

现代社会中,当我们去形容某件事物不着边际,不符合潮流,或是档次不够,地位低下,常用到“不入流”一词。那“不入流”到底不入的是什么流,这个词又有怎样的历史来历呢?

原来,这个词最早出自古代的封建官僚制度,在三国曹魏时代,根据大臣陈群的建议,设立了划分官员等级的九品中正制。后经过南北朝直至唐朝,正式确定了“流内”官与“流外”官,属于九品等级中的官员被称为“流内”,在九品以外的基层事务官员则被称为“流外”。

由于“流外官”大多负责的是文书抄录与档案管理、官署往来公文收发、或物品保管等各色杂事,地位不高,所以站在“流内官”的视角,那些没有划定到九品以内的“流外官”,便是“不入流”。(摘自《语言文字报》丁然/文)

鲁迅订书

鲁迅爱抄书,也爱订书。自别了百草园与三味书屋,定居在北京后,他日记中关于订书的记载日益多了起来。1912年10月13日,恰逢星期天,鲁迅一个人待在家里,“终日订书,计成《史略》二册,《经典释文》六册”。从清晨到日暮,三餐间隙不曾停歇,一日之内竟装订了八册,成效斐然。次日(10月14日)工作日,鲁迅下班后依然兴致勃勃,“晚丁(订)《经典释文》四

册,全部成”。鲁迅订书时的专注令人惊叹。1921年3月30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晚修订《闷斋斋丛书》一部,凡二十四册,费工三日。”二十四册丛书,好生浩大的工程,摆起来也颇有分量,一页一页厘清,一本一本装订,常人面对这样的工程,恐怕早就心烦意乱、难以坚持。而鲁迅竟能耐下性子,三日之内完工,足见其专注。鲁迅的装订功夫了得。

订书是个细活,打孔、搓线、穿针、走线,与女子纳鞋绣花一般,讲究细致与耐心。这份手艺人鲁迅早在求学时便打下了基础。鲁迅的挚友许寿裳曾回忆,鲁迅在日本东京求学时,“独居一室,饮食起居,皆自理之。时薪薄,生计颇艰,衣服多蔽旧,破则自缀补,不以为苦,惟潜心治学,弗旁骛”。读书时练就的针线活,让他订起书来得心应手,非但不觉烦琐,反倒兴趣盎然、乐

此不疲。鲁迅花费在订书上的时间远比一本装订好的书价格高昂,这份亲手修缮典籍的乐趣,这份延续古人治学传统的坚守,远比书籍本身更让他珍视。装订一本书,便是重读一遍书,这一页后是哪一页,不读是不能装订好的;亲手装订的典籍,爱惜之意更甚,摩挲书页时的悦耳声响,堪称读书人心目中的“天籁之音”。(摘自《检察日报》刘城龙/文)

「不入流」溯源